# 家庭暴力相关文献整理

2023年8月31日

## 文献梳理

上月的总结当中我将现有的与家暴相关的文献大致分为两类，首先是从家庭内部处出发，讨论在家庭内部导致家暴的成因；其次是关注家庭外部，对于家暴行为而言，怎样的干预措施是有效的。本月阅读的文献基本还是遵从这个思路进行划分，在这个基础上我更多的关注了家庭内部家暴的成因，对于外部政策影响，我认为大多有效的政策还是通过影响家庭内部来减少家暴的。

**议价权是核心。**首先，在家庭内部大多文献都关注于家庭内部议价权对家暴概率的影响。决定女性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包括女性本身的特质：就业情况(Jensen and Oster, 2009)、受教育情况(Hidrobo and Fernald, 2013)以及最关键的收入情况(Aizer, 2010)，简而言之，女性经济越不依赖于丈夫，受到家暴的概率会越低。除了经济上的议价权以外，能否单边离婚也属于家庭内部议价权的一部分(Jensen and Oster, 2009)。影响家庭内部议价权的外部冲击包括两种：一种是政策冲击：贸易政策Molina and Tanaka（2023）、针对女性的现金转移政策(Hidrobo and Fernald, 2013)、基建政策(Bargain et al, 2019)等，这些外部政策改善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权，从而降低了他们被家暴的概率；另一部分是自然影响，例如暴雨灾害使得女性经济议价权降低，从而可能导致更多家暴(Diaz and Saldarriaga, 2023)。同样的，当男性在家庭当中的议价权提高时，女性遭受家暴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La Mattina, 2017)探究了卢旺达大屠杀后的家暴概率，揭示由于性别比降低使得男性在家庭当中议价权增大，从而导致女性受到家暴的概率增大。

**但议价权和家暴未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但还有一支文献给了我一些启发，让我觉得议价权的提高未必一定能减少家暴（之前我做的描述性分析当中，也确实有一部分的样本：妻子相对于丈夫的收入提高时，受到家暴的概率反而更大）。例如(Erten and Keshin, 2021)认为女性赚钱能力降低减少了男性通过暴力行为攫取租金的动机；也有可能部分男性不喜欢自己的配偶外出工作，因此女性外出工作的同时家暴概率也会上升(Field et al, 2016; Guarnieri and Rainer, 2021)。此时家暴的动因是基于“a lost authority or gender identity as the “family provider”的报复性行为。

因此虽然探究议价权与家暴这二者之间关系的经济学文献已经较多，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文章讨论议价权与家暴概率之间非单调关系，我之前的想法是将女性的经济状况分为绝对经济水平和相对经济水平，可能存在一个决定经济水平的门槛，高于这个门槛，女性经济能力的增强才能提高议价权进而降低被家暴的风险。如果不能直接找到一个明确的节点的话，也可以把这一条当作异质性分析

**不仅是议价权的表现，暴力也可能是手段。**有几篇文献关于了男性的暴力动机：(Pollak, 2004)构建了一个家暴在代际之间传递的模型，认为父代家庭出现家暴的概率与子代发生家暴的概率呈现正相关关系；(Card 和 Dahl, 2011)则提出亲密关系之间的暴力行为是与经济报酬无关的情感冲动所引发的，因此丈夫支持的球队失利很可能导致家暴增多；以及我最感兴趣的一条渠道：男性也可能通过暴力行为加强其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Anderberg and Rainer, 2013)，以及在家庭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可能更加严重(Diaz and Saldarriaga, 2023)。因此可以关注外部冲击通过景象家庭收入进而影响家暴的方面。

## 毕业论文的思路

首先，对于x的选择我还没有完全确定。在贸易政策的外生冲击上，Molina and Tanaka（2023）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家暴的影响，如果要用贸易政策的冲击，我想结合(Aizer, 2010)与(Li, 2018)的研究，利用各地区厨师产业构成的变化和各产业间技能密集度的差异，构建女性密集与女性非密集出口需求冲击的地区衡量指标，看出口冲击是否影响了家暴发生率。

独生子女政策对家暴情况的影响我目前主要就想到了一个：即女性生育数量减少可能使得其更容易参加工作，从而提高经济议价权进而减少家暴；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作用渠道。

以及我其实也比较想看一下产权的影响（但这方面的文献我还没来得及看），感觉这个渠道可以分城镇（分房）和乡村（分地）来看。

以及我觉得外生冲击通过影响家庭收入进一步影响家暴概率的作用渠道也很有意思。